

体系化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

□ 刘德成

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这为我们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谋取竞争发展新优势指明了方向。加快提升新质战斗力，要紧跟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和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规律，扭住重点新兴领域，强化体系建、建体系的思想，更新思维理念，创新方法手段，坚持体系布局、体系设计、体系推进、体系评估，统筹设计新兴领域一体化规划布局，成体系筹划和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

强化军事需求牵引。军队建设中，需求牵引具有基础性作用。军事需求处于战略管理链路的前端，是军队规划建设的起点、源头。要站在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大背景下谋划设计，瞄准前沿找准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突破方向，构建新质战斗力军事需求意见征求对接机制，形成开放包容的军事需求格局，加强一线调查研究，集智破解军事需求生成难、统筹难等问题，充分发挥作战需求对新质战斗力体系能力达成的牵引作用，推动新质战斗力建设需求及时进战略、进规划，紧紧扭住目标指向，围绕规划目标制定、成本效益比较等要素，构建体系完备、有效牵引的目標指标体系，明确战略目标、科学制定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能力指标清单，确保需求科学提报、精准对接、敏捷响应，牵引规划建设有效落实。

强化政策制度保障。政策制度管根本、利长远，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是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的长久之计。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考虑军队与地方、系统与要素、当前与长远等各方面关系，破解制约新质战斗力建设质效提升的政策障碍、制度壁垒和机制弊

端，找准重大政策制度与新质战斗力建设相关具体工作的结合点，创新战略管理制度，构建军费管理制度，加强军事资源统筹安排，着眼长远、标本兼治，从顶层设计上加速推进法规制度建设集成化、军事法规法典化，形成有利于发展新质战斗力，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战略管理政策制度体系。

强化组织统筹协调。组织严密才能力量倍增，体系健全方能行动有力，只有形成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才能激发强大的组织动力和执行力。把握新体制下战略规划工作特点规律，架构组织体系、厘清职责任务、健全运行机制，依托战略规划决策及议事协调机构，把新质战斗力相关规划执行管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党委工程和胜战工程，加强宏观指导，常议常抓新质战斗力规划建设任务攻坚，形成各级党委强统揽、领域部门唱主角、主建单位挑大梁的工作格局和“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责任链路，以真抓的实劲、严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持之以恒抓下去落到底。

强化绩效评估督导。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重要工具。着眼以战领建、抓建为战，构建覆盖全面的作战能力绩效评估链，坚持分级分类、各负其责、合力攻坚，加快构建权责清晰、贯通衔接的规划执行责任体系，完善定期盘点、常态监测、季度分析、精准评估等机制，抓好新质战斗力规划项目建设过程管控，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控稳节奏、卡住节点、精准督责，统合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和作战能力检验评估，对滞后项目、风险项目实行晒单挂账、挂牌督战、点名通报等方法，强化全流程监管，构建起规划牵头部门监测、领域监测、主责单位监测等有序衔接的过程管控，贯通执行闭合链路，打好新质战斗力项目建设攻坚战。

强化协同联动攻关。规划计划

执行管理是系统工程，特别是在规划堵点梗阻攻关过程中，离不开领域联动、军地协同。只有以强烈的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加强跨领域、跨单位、跨军地联合推进，搞好体系筹划、科学统筹任务、合理设置计划、优化资源配置，才能确保新质战斗力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在实践中，加强制度机制创新的协调联动和衔接配套，处理好组织统筹与分层对接的关系，强化部门分工协作，凝聚合力，构建内部横向联合、上下纵向联动、军地跨界协调的融合体系，健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的攻关体系，把各领域联起来、各要素统起来，产生化学反应。

强化智库外脑辅助。智库的关键在“智”，作用是发挥智力优势，以“智库”促“智胜”。在新质战斗力建设规划执行管理中，吸收充实相关领域专家外脑力量，吸收新兴领域专家，打造专家智库，壮大外脑支撑功能，围绕重大工程项目推进、重难点矛盾问题破解，以课题研讨支持决策科学，组织集智攻关，开展政策、制度和机制等研究，提出创新性、建设性和针对性对策建议及“伴随式”服务，最大限度激发智囊作用，释放“智慧因子”，为新质战斗力规划建设高质量落实提供有力有效的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撑。

强化数据赋能驱动。数据，既是战略资源，也是规划执行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新兴领域层出不穷。在大数据、云计算加速创新背景下，有效运用、有力把控数据，是提升新质战斗力规划建设效益的重要引擎。加强建设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公共数据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为依托，完备新质战斗力建设相关项目动态管理数据库，打破数据壁垒，借助大数据服务平台，系统推进建设项目管理数据化、数据服务

化、服务智能化，以科学算法激发服务效能，加强在线监测和网络督导，让数字化赋能新质战斗力建设规划执行管理。

强化制约监督问责。减少损耗、杜绝浪费，优化资源配置，是规划执行管理的题中之意。从严追责问责，是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方法。将新质战斗力规划计划执行常态检查督导嵌入巡视巡察、审计监察，纳入干部考核评价和建设单位评先评优体系，纪检监察全程介入，坚决制止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列计划，项目管理疲软、执行落实拖沓，以及同一项目重复建设，甚至出现趴窝、烂尾等项目管理问题，实施全链路、全方位、常态化监管，让巡视利剑高悬，打造精品工程、阳光工程和廉洁工程，以强力监督助力新质战斗力建设廉洁优质高效推进。

强化专业人才建设。人才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核心要素，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新质战斗力建设。加强新兴领域专业人才建设，立足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以新质战斗力能力需求和人才分类指导目录为基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完善新兴领域专业人才发现、培养、激励等机制，优化科研竞争生态和人才成长环境，激发内生动力，拓展开放式办学空间，依托地方知名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军内外智库等优质资源，聚焦新域新质前沿，深化军地联动理论研究，建立咨询专家库和专业导师库，统筹构建多元化教学人才矩阵，最大限度提高人才培养体系贡献率，推动新质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高效落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部）



蒋家河口战斗：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

□ 李国杰 曹溶容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一部在巢县（今安徽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地区主动设伏，对日寇发动突然袭击，整个战斗仅用20分钟便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新四军则无一伤亡。此战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不仅沉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开赴皖中，挺进敌后

1938年1至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战斗在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和鄂豫边区的桐柏山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下辖第7、第8、第9三个团以及1个手枪团，共计31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遵照毛泽东关于“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1938年3月，高敬亭率第4支队离开大别山区向皖中挺进，并于4月中旬抵达皖中敌后，展开于安徽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区。其中，第9团进抵盛家桥和巢县槐林嘴一带。第4支队进抵皖中后，和中共皖中地方组织一道，一方面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充分动员组织群众，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战略侦察，为敌后抗日做好充分准备。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渡过长江侵占津浦铁路南段的滁县（今安徽滁州）、明光、蚌埠等城镇，并分兵占领巢县、合肥等地，进而控制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日军企图以此为据点继续沿津浦铁路北犯，并与沿津浦铁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南

北夹击徐州，继而向西进逼中原，夺取武汉。

化装侦察，探明敌情

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抗日斗志，同时也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4支队第9团进至盛家桥后，立即召开团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一定要寻机歼敌并取得胜。会议决定由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带领侦察队进入屏屏山地区，寻找战机。团长顾士多、政治处主任高立中带领部分战士到盛家桥、槐林嘴一带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剿匪安民活动。

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高志荣前往该地区的国民党军了解情况，但没有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高志荣决定另想他法。回到团部后高志荣立即让侦察队员化装成农民到巢县附近侦察敌情。经深入了解情况，侦察队员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巢县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9团侦察参谋郭思进和团侦察队长又共同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经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8点到9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巢县出发，多时30余人，少时10余人，上岸后在周围抢劫糟蹋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巢县。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

新四军开会研究后，第9团决

定将伏击地点选定在蒋家河口，伏击任务由团侦察队和2营4连共同承担。为便于作战指挥，高志荣、唐少田还亲自带领几名干部登上银屏山顶，现场手绘了一幅作战地图。

隐伏待机，奋勇歼敌

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的运漕河（今裕溪河）西岸，距离巢县大约5公里。河口一带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河道纵横，地形十分复杂，河堤便便于隐藏，是伏击敌人的绝佳地点。5月11日傍晚，伏击部队在团侦察参谋郭思进和2营营长黄仁庭的带领下，利用暗夜秘密潜伏至蒋家河口。我军的作战部署是：团部侦察队隐藏在河口西岸堤埂后面，从正面截击敌人；4连2排隐藏在侦察队后面的小村里；4连连长率1、3排潜伏在北面距离河口四五里远的小山包下，准备阻击由巢县增援之敌。次日拂晓前，我军参战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进入指定阵地。

上午8时许，两艘日军船只由巢县方向驶来。新四军战士匍匐在芦苇和草丛上，两眼紧盯河面，只待敌人一上岸便对其发动突然袭击。不多时，敌船靠岸。一些日寇下船后毫无戒备，敞开衣服，捧起河水向胸前浇洒，不少人倒背着枪，边上岸边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只听“啪”一声枪响，一名日寇应声倒地，这是郭思进发出的战斗信号。霎时间，埋伏在四周的团侦察队的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日寇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遭到

突袭的日寇，有的跳入水中企图登船逃窜，有的爬上河岸负隅顽抗。3排迅速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断敌退路，侦察队则乘势而起，集中手榴弹将敌船炸翻。我军居高临下，很快便占据了绝对优势。日寇被逼下河，困于水中，难以施展，只能被动挨打，结果大部在水中被歼。一名日寇企图趁乱潜水逃跑，侦察队一名战士发现后，急忙奋力跃入水中，一把卡住敌人的脖子将其死死按在水里，很快这名日寇便一命呜呼了。整场战斗，出敌不意，动作干净利落，仅用20分钟便将来犯的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的20多名敌人全部歼灭，除缴获10余支枪外，还有1面日本军旗、少量弹药和指挥刀等战利品，我军则无一伤亡。

战斗胜利后，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我军打捞敌人摔入河中的物品。不久，各地纷纷致电表示祝贺。国民政府也在媒体上及时刊载了这一消息并迅速传遍全国。蒋介石还特地于5月16日致电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对第4支队提出嘉奖。当地群众还将此次战斗编成歌曲演唱，歌颂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此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的第一战，也是新四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扩大了新四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江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境内（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胜利实现会师，随后携手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打破了蒋介石把6万多红军饿死、困死在康北高原的迷梦。在甘孜会师过程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严格遵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铸就了民族团结佳话。

以严明军纪争取藏族同胞认可支持

甘孜会师的康北地区是藏族同胞聚居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广大藏族同胞对红军并不了解，反动派又千方百计地煽动和利用当地藏族武装围堵红军。因此，能否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成为关系到会师成败、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当红军最初进入甘孜时，藏族同胞出于疑惧大都躲到了深山。面对这种情况，红军总司令朱德当即宣布几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久，疑雾终于逐渐消除，藏族同胞也陆续从山上返回，甘孜重新热闹了起来。

藏族群众多信奉藏传佛教，寺庙在当地有着特殊地位，要想使藏族同胞真正从感情和心理上认同接受党和红军，就必须尊重其宗教信仰。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向甘孜进军过程中，进入的第一个藏族同胞聚居地是中甸，当时中甸城只有几百户藏民，红军一到，大都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寺院名叫归化寺，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贺龙、任弼时要求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并以贺龙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编者注：旧中国时称藏族同胞为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而来。同时，深入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政策。一万多红军来到这几百户人家的小县城，不杀、不抢、不抓夫，还和和气气。在此情况下，归化寺里的一位管事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和红军“首领”谈判。

贺龙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写了一封给归化寺活佛的信请夏那古瓦转交，信中写道：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喜；红军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钱；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贺龙的行动消除了喇嘛们的疑惧，归化寺活佛也邀请贺龙前往做客。1936年5月2日，贺龙到归化寺拜访活佛，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随后，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几天内，红军就筹集到了宝贵的10万余斤粮食。

红军团结争取藏族上层人士

康北地区的藏族上层人士不仅控制着武装、粮食、牲畜等物质资源，而且还从精神和行动上控制着广大的藏族群众，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难做普通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曾经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是，针对康北地区的特殊情况，党对当地藏族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政策，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保护其利益，积极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或结盟。

在当时康北各土司中，德格土司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个，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后，德格土司命大头人夏克刀登率军袭击红军，结果在战斗中夏克刀登受伤被俘。红军非但没有杀他，反而为他精心疗伤后送回土司辖区，夏克刀登被红军优待俘虏、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所感动，转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并且做通了德格土司的工作。1936年4月，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德格土司代表夏克刀登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此举不仅解除了康北最强大的土司武装对红军的军事威胁，其他的大小寺庙、土司头人听闻实力雄厚的德格土司已与红军合作，一般也不再采取对抗行动。从此，红军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后，当红二、六军团北上甘孜途经德格土司辖区时没有受到阻击，这也与《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有直接的关系。

大批藏族青年投身革命

随着藏族同胞与红军的接触以及不断加深对红军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受党的政策感召，纷纷参加红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基础上，党在当地先后建立了自卫军、游击队、丹巴藏民独立师等藏族武装，特别是丹巴藏民独立师是在党

甘孜会师铸就民族团结佳话

□ 曲洛松

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支以少数民族命名的正规部队，全师有2000余人，大部分是受党感召的藏族青年。

这些参加红军的藏族儿女在甘孜会师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藏族红军战士通晓民族语言，群众基础广泛，可以拉近军民关系，有助于战斗、行军、开展民族工作。二是藏族红军战士熟悉当地社会状况，可很好地执行向导、侦察等特殊任务。三是这批藏族红军战士后来成长为党培养的最早一批藏族干部，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愿参军，成为最早的一批投身党的革命事业的藏族先驱。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天宝，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曾任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等都是在川康藏区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

藏族同胞悉心照料红军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是在南下失利后进入康北地区的，在南下作战期间，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并出现大量的伤病员。红二、六军团进入川康藏区后虽未进行大的战斗，但自长征离开根据地后连续转战、无法休整，加之川康藏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患病人数也急剧增加。因此，当两大主力红军在甘孜会师后北上时，不得不把总数约3000人的伤病员留在甘孜地区，当地藏族同胞则挑起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重担。

当时藏族同胞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办法主要有：一是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一村，一县转一县地护送；二是群众愿收留红军的都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三是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遗弃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当地藏族同胞有的一家收养一个或几个，有的几家合养一个，留下的红军伤病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照顾，仅甘孜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保护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藏族同胞把留下来的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求医问药，精心护理。后来国民党军进行搜捕时，藏族同胞以各种办法保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用钱买通国民党军队，有的以武力对抗，有的把红军伤病员藏在森林、岩洞等处。许多红军伤病员康复后得以追赶重返部队，继续长征，还有的红军伤病员则在当地安家，与藏族同胞融为一体。

